

菲德尔·卡斯特罗

蒙卡达审判

El juicio del Moncada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古巴] 玛尔塔·罗哈斯 著 徐世澄 译

革 命 不 是 玫 瑰 床 , 而 是 未 来 和 过 去 的 斗 争



菲德尔·

蒙卡达审判

El juicio del Moncada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古巴] 玛尔塔·罗哈斯 著 徐世澄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蒙卡达审判 / (古巴) 罗哈斯著；徐世澄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4.3

ISBN 978 - 7 - 5075 - 4153 - 3

I. ①蒙… II. ①罗… ②徐… III. ①卡斯特罗，
F. —传记 IV. ①K837. 517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9702 号

北京市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 - 2014 - 0845

本书附录《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由世界知识出版社授权出版

蒙卡达审判

著 者：(古巴) 玛尔塔·罗哈斯

译 者：徐世澄

责任编辑：张立坤 郑 磊 纪希萱

助理编辑：姜 珊

出 版：华文出版社 五洲传播出版社

发 行：华文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com.cn>

电 话：市场营销部 010 - 58336267 58336270 责任编辑 010 - 63427615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 × 1000 1/16

印 张：22.25

字 数：300 千

版 次：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5075 - 4153 - 3

定 价：4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献给许多牺牲的人和从一开始就相信菲德尔的少数人。

——作 者

中文版序言

得知中国的读者，特别是青年人，将有机会看到这部价值非凡的书的中文版，我心中充满喜悦。今年恰逢我们庆祝攻打蒙卡达兵营和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兵营 60 周年和庆祝我国民族英雄何塞·马蒂诞辰 160 周年。何塞·马蒂不朽的思想和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是那些攻打兵营的年轻人的思想源泉。

我想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玛尔塔·罗哈斯·罗德里格斯。她是一位杰出的记者和作家，出版过多部小说、报告文学、新闻采访和其他文章。她旁听了 60 年前审判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的全过程，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见证人。在那次庭审中，年仅 26 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律师身份担任了自己的辩护律师，他的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跨越了时空，至今仍具现实意义。

在审判过程中，被告成为原告，控诉了当时的独裁政权和病态的社会。

玛尔塔·罗哈斯以翔实的资料以及 1953 年 7 月 26 日之后的个人笔录，为我们展现了攻打兵营之前、期间以及之后的古巴社会政治生态。同时，她以新闻记者勤奋钻研的探究精神，帮助我们去理解一位领袖走过的革命生涯，去理解古巴革命的必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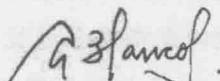
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虽然在攻打蒙卡达兵营后历尽艰辛，饱受诽谤和污蔑；虽然被关在单人牢房达两个多月，当局企图用新闻检查封住他的口；虽然出庭时周围站着几百名持枪的士兵，但是他没有怯懦。他用智慧和勇气捍卫了自己的信念，捍卫了几十名抱有同样理想的被杀害战友为之奋斗的正义事业；他同时还宣布了一份代表人民意愿的纲领。菲德尔·卡斯特罗又一次转败为胜，又一次让不可能的事情变为现实，彰显了思想的

威力。

攻打蒙卡达兵营、审判攻打战士五年半之后，古巴革命取得了胜利。正如古巴革命领袖 1953 年 10 月 16 日所预言，在蒙卡达兵营遭到杀害的英雄遗体上，吓破了胆的刽子手看到的是思想胜利的幽灵在冉冉升起。

我相信，这本书一定会受到中国几代读者的关注，特别是引起律师、记者、历史学家、研究员和军人的兴趣。

我想借此机会向出版《蒙卡达审判》中文版的中国出版社表示特别的谢意，感谢他们提出了出版《蒙卡达审判》的积极倡议。我也向杰出的研究员徐世澄先生表示谢意，感谢他将这本价值非凡的书翻译成中文。



古巴驻华大使
白诗德

再版序言

有些重要的“事件”——由于其意义，由于其产生的能量而重要——只有当它向我们展示其完全的历史价值时，我们才能将其定性为重要事件。重要事件是指在当时具有创造性和预见性的事件，标志着某个历程的起点。这个历程是辩证的，总是会促进未来的行动，由于其根本理想的不断实现，在持续增长的广阔前景中，这些行动越来越公开。

但是，这类预卜吉凶的重大事件在开始时，常常没有有效的见证人，也没有记者在现场生动地记述事件发生的经过，而是在事件发生之后，几代历史学家查阅档案和图书资料，然后尽可能精确地描绘“那一天”所发生的事件，那不是平常的一天，而是影响到全体人民命运的一天。有一个十分有趣的例子，攻打巴士底狱^①事件在当时很少被编年史关注，很多人认为这一事件与当年所发生的许许多多骚乱一样，没有多大区别。当时，只有一位名叫雷蒂夫·德拉布雷东^②的历史学家很好地记录了这一历史事件。他在《巴黎的夜晚》这部对研究法国大革命具有宝贵价值的文献著作中写道：“当想观看攻打巴士底狱时，一切都已结束。”（第384晚）雷蒂夫·德拉布雷东就像法夫里西奥·德拉卡图哈·德帕尔玛一样，由于偶然的原因，参加了滑铁卢战役。后来，有人问道：“他所看到的真的是滑铁卢战役吗？”

因此，值得庆幸的是，有些特别重大的事件有记者在历史的关头在现场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把当天所发生的情况记录下来，成为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人民编年史，而其他所有的人却平

^① 巴士底狱又名巴士底要塞，始建于12世纪，位于巴黎城门前。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同年7月14日，巴士底狱被反对法国王室专制的巴黎市民摧毁。攻占巴士底狱的行动成了当时法国全国革命的信号。——译注

^② 雷蒂夫·德拉布雷东（1773—1806），法国著名作家和历史学家。——译注

平常常地度过了这一天。尤其是在这一事件中，一个非法、专制和罪恶的政府由于害怕这一事件影响，动用一切手段对公众舆论隐瞒今天众所周知的对攻打蒙卡达兵营事件的审判。这一审判于 1953 年 9 月 21 日至 10 月 16 日在古巴圣地亚哥进行。

我们和历史学家感到庆幸的是，这一口头审判由本书作者玛尔塔·罗哈斯忠实地记录下来，最终促使了这本书的新版本得以展现在我们面前。

梅尔瓦·埃尔南德斯和埃德·圣玛丽亚曾为这本书初版写了序：

“《百周年一代在蒙卡达》这部著作^①是对古巴圣地亚哥法庭 1953 年第 37 号案件生动而客观的记录……玛尔塔同志作为记者出席了所有的有关蒙卡达事件的审讯，包括 1953 年 10 月 16 日在萨图尔尼诺·洛拉医院护士室举行的对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的审讯。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这一审讯中发表了历史性的自我辩护词，即《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这一反帝的民族解放斗争纲领，这一纲领已通过古巴革命完全实现。”

“从一开始，玛尔塔就具有一个未来的计划，她在作记录时不是为记录而记录，而是认真地、小心翼翼地观察在审讯场所士兵的刺刀下发生的所有事情。她敏锐地觉察到在法庭上将产生一颗革新的种子，这颗种子将彻底改变这个腐朽社会的根基，那里不是决定一小部分青年人的未来，而是决定全体人民的未来。我们认为，这本著作反映了古巴人民争取解放的事实和愿望，它将帮助我们充分了解蒙卡达战士所追求的目标和他们攻打蒙卡达兵营的缘由。一些参加攻打蒙卡达兵营行动的战士在读了这本著作后表示，他们感到绝对的放心，因为这一行动的最主要方面在书中均得到真实的反映。”

没有任何人可以像曾经积极地、直接地参加蒙卡达行动的这两位模范女战士那样最有权威地担保玛尔塔·罗哈斯所叙述的事

^① 本书第二版的书名是《百周年一代在蒙卡达》。

件的准确性，这是对本书作者的支持。许多历史学家都很羡慕这位作者，因为她有幸不必使用第二手材料而直接写出这本书。

玛尔塔·罗哈斯是机灵的、天才的作家，是有着深厚功底的记者，她的写作简单明了，用简明扼要的话表达很多东西。她是海明威的崇拜者之一，海明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有些记者在报道诺曼底登陆事件的速度和综合能力方面超过了海明威，他们自称是他们——而不是海明威——将最终成为这一事件中最优秀的记者……1967年的一天，我和玛尔塔在斯德哥尔摩罗素法庭上为美国军队在越南战争中犯下的暴行作证时，我觉察到她的发言是那么言简意赅、铿锵有力。我还读到她写的许多有关当代史上其他重大事件的评论和报道，我被她生动的笔触和杰出的才华所折服。

从这本书的每一页都可以读到她了不起的记者风格。如电影镜头一样，她迅速进入状态：“所有的被告都戴着手铐被押到审判厅。100多位被告手腕上的镀铬手铐发出的金属响声使在场的人吃了一惊。菲德尔·卡斯特罗停顿了一下，然后想对法官说话。而卫兵们，如临大敌，将子弹上了膛。长15米、宽7米的长方形审判厅里约有200来人，在厅外还有许多人。总共有600多名卫兵守卫在司法大楼所在的街区。”玛尔塔·罗哈斯一开始就描绘了审判庭的场面，她用了几行字勾画出布景，接着，又立即叙述充满威胁气氛的行动……审讯在继续，玛尔塔·罗哈斯使我们一直处在非常紧张的状态：“……周六到了，全副武装的卫兵重新回到岗位。法庭人满为患，屋顶平台上、地下室，甚至洗手间里都挤满了人。参与审讯的法院工作人员、律师、被告的家属和记者们看到蒙卡达战士从法庭的第二层平台下来。审判庭面向刚刚落成的司法大楼的中心院子，绿地的花草还很稀疏，院子中央只有一棵细小的、正在成长的树。”这里，玛尔塔·罗哈斯这位出色的小说家，利用周围细小的元素（贫瘠的花草）来突出人的行动……直到菲德尔·卡斯特罗发表历史性的演说《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医院的职工和卫兵们开始找地方观看和聆听菲德尔自我辩护，一开始纯粹是出于好奇。后

来，菲德尔的辩护词引起众人极大的兴趣，他们不得不轮换位置，使大家都能听一听。菲德尔就这样开始了他的历史性的自我辩护词，他越讲，人们越急着往下听。他的话语是多么的不同……后来，菲德尔本人在松树岛监狱里又将这些辩护词整理出来，亲自用柠檬汁写在小纸片上，设法转交给梅尔瓦·埃尔南德斯和埃德·圣玛丽亚。在其他同志的帮助下，她们于 1954 年将其出版并秘密散发……”今天，卡斯特罗这一演说的全文已翻译成多种文字，许多当代历史学家予以评论。而玛尔塔·罗哈斯正是以卡斯特罗这一演说的全文作为她记述蒙卡达审判的结尾，并成为记述蒙卡达审判的编年史家。

书中有她本人的思考：“审判的结局是六年后，革命的胜利……在 10 月的一个早晨，蒙卡达审判结束。1953 年 7 月 26 日，烈士鲜血所播种和浇灌的革命种子第一次发芽，成为一个能够团结人民、武装人民夺取胜利的理论工具，而在马蒂诞辰百周年之前，好几代古巴人的斗争都未能取得胜利。”

将来，谁想了解蒙卡达审判，必定要查阅玛尔塔·罗哈斯写的这一有说服力的、真实的报道。

当读到玛尔塔·罗哈斯书中的一句话——“这一事件的结果是六年后，革命取得了胜利”时，我联想到一个惊人的巧合。1911 年 12 月 3 日，巴黎举行了劳拉和保尔·拉法格^①的葬礼。值得一提的是，保尔·拉法格是一位革命者，卡尔·马克思的女婿，他生于古巴圣地亚哥市，他的祖母是加勒比混血种人，他为自己“血管中流淌着被压迫的种族的血液”感到自豪。在为巴黎公社战斗之后，他又积极投身于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列宁在葬礼上发表讲话，赞扬了拉法格。列宁说：“我们俄国人了解亚洲

^① 保尔·拉法格（1842—1911）是法国与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法国工人党与第二国际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拉法格是法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868 年与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结婚。1911 年 11 月 25 日，保尔·拉法格和妻子劳拉在俄国服用氰化钾自杀。12 月 3 日，拉法格和劳拉的遗体在拉雪兹墓地火化。法国与欧洲的工人和社会主义活动家为这对工人阶级的忠诚战士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专制主义暴政的压迫，对我们来说，我们有幸在拉法格本人和他的朋友的著作中，直接了解到欧洲工人的经验和革命思想。现在，很明显，拉法格为之献身的事业将很快取得胜利。”

我想指出，列宁是在 1911 年说这番话的。六年后，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后来任总司令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圣地亚哥市对法官说：“判决我吧，没有关系，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恰恰也是在他讲这番话六年后，古巴革命取得了胜利。

各国的编年史中常常有如此相似的事件。

阿莱霍·卡彭铁尔^① 1979 年

^① 阿莱霍·卡彭铁尔（1904—1980），古巴著名作家。曾任古巴全国文化委员会副主席、作家和艺术家联合委员会副主席、国家出版局局长。著有长篇小说《启蒙世纪》《这个世界的王国》等。——译注

初版序言

我们认为《百周年一代在蒙卡达》这本著作是对古巴圣地亚哥法庭 1953 年第 37 号案件的生动、客观的记录。作者玛尔塔·罗哈斯同志在书中记载了她旁听案件审讯过程的记录以及其他有历史价值的资料。我们两人被瓜那哈依监狱释放后，她与我们保持联系，进行了多次会晤，其中有几次还有其他几位曾参与攻打蒙卡达兵营的同志参加。她获得了有关革命运动组织的材料以及许多牺牲烈士的生平，她对这些资料、文件和行动初期的文字材料加以研究和梳理，使书中有价值的史料更加丰富和充实。

玛尔塔作为记者出席了所有的有关蒙卡达事件的审判，包括 1953 年 10 月 16 日在萨图尔尼诺·洛拉医院护士室举行的对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的审讯。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这一审讯中发表了历史性的自我辩护词即《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反帝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纲领，这一纲领已被古巴革命所完全实现。

从一开始，玛尔塔就具有一个未来的计划，她在作记录时不是为记录而记录，而是认真地、小心翼翼地观察在审讯场所士兵的刺刀下所发生的所有事情。她敏锐地觉察到在法庭上将产生一颗革命的种子，这颗种子将彻底改变这个腐朽社会的根基，在那里不是决定一小部分青年人的未来，而是将决定全体人民的未来。我们认为，由于这本著作反映了古巴人民争取解放的事实、意愿和渴望，它将大大地帮助我们充分了解蒙卡达战士所追求的目标和他们攻打蒙卡达兵营的缘由。一些参加攻打蒙卡达兵营行动的战士在读了这部著作后表示，他们感到绝对的放心，因为这一行动的最主要方面在书中均得到真实的反映。为对在 1953 年 7 月 26 日攻打蒙卡达兵营行动中牺牲的战友表示敬意，这里我们引用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自我辩护词中的一

段话：

“在我们的先驱者百年诞辰的今年，对他的崇敬好像要消逝了，对他的怀念好像要永远磨灭了，多么可耻！但是他还活着，没有死去，他的人民是富于反抗精神的，他的人民是高尚的，他的人民忠于他的主张！有些青年为了让他继续活在祖国的心中，心甘情愿地死在他的墓旁，贡献出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古巴啊！假如你背叛了你的先驱者，你会落得什么样的下场啊！”

假如让民族起义消失、拉美各国的同情消失、对受苦受难和不屈斗争的人民的声援消失，将会意味着什么！而古巴工人、农民、学生和人民进步阶层的忠实代表——百周年一代从未停止为理想而牺牲，他们经过无数磨难，终于迎来 1959 年 1 月 1 日革命胜利的曙光，迎来吉隆滩战役的胜利，这是美帝国主义在美洲大陆的第一次失败。如今，百周年一代人正在为我们的祖国建设社会主义而阔步前进！

誓死保卫祖国，我们必胜！

埃德·圣玛丽亚

和梅尔瓦·埃尔南德斯

1964 年

我是如何撰写这本书的（代序）

我撰写此文是为了满足许多读者的兴趣，回答他们在此书推介仪式上以及在给我的信中常常向我提出的问题：我是如何进入蒙卡达兵营的，是如何能出席第37号案件的审判的，是如何写这本历史见证书的。情况是这样的：

1953年，当第37号案件的庭审每次在中午结束时，我走出法庭时手里都拿着我折叠成手风琴式样的、报纸般大小的笔记本，步行20个街区回家。在经过圣地亚哥城的小山坡时，人们围着我询问有关蒙卡达审判的进展情况。我尽可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向他们讲述细节和对话，回答他们所提的问题。有时候，我查阅一下我的笔记，以便确切地说出人名和具体的话语。但有的问题，我回答不了。

回到家里，几乎总能遇到我妹妹米尔塔在师范学校的一些女同学，我给她们念我有关审讯的笔记。晚上，当我准备将我的笔记用打字机整理成报道时，我的妹妹和她的几位同学，特别是与马塞奥将军夫人有亲戚关系的玛尔塔·卡布拉莱斯常常帮助我解读我的手稿。

尽管当时报刊审查和《公共秩序法》依然有效，我还是将每天蒙卡达审判的记录整理出来，就好像要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发表一样。我想把关于蒙卡达审判的全部记录整理出来，提交给《波希米亚》杂志社社长。

我与《波希米亚》杂志直接的联系是在1953年7月26日当天，该杂志驻圣地亚哥的摄影师、我的邻居潘奇托·卡诺打电话给杂志社社长米格尔·安赫尔·克韦多说，我和他以及其他几位记者一起都在蒙卡达兵营，等待驻扎在兵营的团指挥部准许我们到蒙卡达兵营实地采访，一旦我们得到有关材料，就立即写出有

关7月26日发生的事件的报道。

我和潘奇托两人在7月25日晚上和26日凌晨都参加了圣地亚哥传统的狂欢节活动。我们在拉特洛查大街相遇，我同我的朋友在一起，他同另外几位摄影师在拍照片。因为他认识我，所以要我写一篇有关狂欢节的报道以及图片的说明。这对我来说不用费多大的劲。然而，当我们正准备回家时，听到了枪声。当时，我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也不清楚是哪儿的枪声。同大多数周围的民众一样，我们还以为是狂欢节上点放的中国鞭炮声或烟火声。

“是枪声，”潘奇托不高兴地说。

接着，他对我说：“看来写狂欢节报道一事会告吹。”

“那么，我们可以写有关枪声的报道。”我对他说，当时我并没有想到我的这一回答会成为我的决定。

我们设法寻找消息的来源。当时我绝没有想到我会成为古巴和拉美历史上一个重大革命事件——1953年7月2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战友攻打蒙卡达兵营的特别见证人。

我们匆忙离开拉特洛查大街街区，这里与马蒂大街一样，集中设立了狂欢节最活跃的小亭子。在这里，在蒙卡达最初的枪声响起前，洛斯奥约斯和埃尔蒙卡达的孔加舞蹈团曾一起在喇叭声、鼓声和中国唢呐声伴奏下闪电般地狂舞。

我们沿着科罗纳大街走，走过了几个街区，到达原《古巴日报》社旧址。在报社门口，潘奇托同《古巴日报》和《宇宙报》记者聊了聊。由此了解到真实的消息：根据他们的说法，所听到的绝不是烟火或鞭炮声，而是蒙卡达兵营士兵之间发生枪战的声音。

这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因为自1952年3月10日以来，局势一直很动荡。

我们继续往前走，我到了家，为的是不让我的家人感到吃惊。几乎所有的街坊邻居都在门口或在窗户旁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得到的回答总是：“是士兵们开的枪……”不一会儿，摄影

师找我一起去蒙卡达兵营。当时枪声基本上已经停止，尽管还不时听到步枪和机关枪的声音。我们走了几条街，一直走到团部入口处的“可口可乐”岗哨。之所以这么称呼这个岗哨，是因为它就在“可口可乐”工厂附近。许多记者和穿着百姓服装的人群汇聚在岗哨前。后来我得知，他们是所谓城市“有生力量”的代表，急于知道发生武装冲突的原因。

大约上午 11 点钟，或许更早一些，我们进了蒙卡达兵营的主楼，一名士兵把我们带到了团长办公室的前厅，让我们在那里等候新的通知。

摄影师就在我身边。他过一会儿又回到我身边，问我愿不愿意要求上卫生间，以便在半道上同两位被捕的妇女见面，他还告诉我这两位妇女被关押的地方。于是我要求上卫生间，沿途慢慢地走着，努力发掘写报道的素材。果然，我见到了两位妇女，其中一位金发的妇女看了我一眼。后来我得知，她就是埃德·圣玛丽亚。

我回到了办公室前厅。我们在那里等待（团长）查维亚诺举行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直到 7 月 26 日下午 1 点多才举行。

这时潘奇托与《波希米亚》杂志社社长取得了联系。他报告社长克韦多说我与他在一起，准备写报道。社长觉得这主意不错。潘奇托告诉我，社长对他说，《波希米亚》杂志“在古巴”栏目主任恩里克·德拉奥萨将派几位他信得过的记者乘飞机赶到圣地亚哥来。这几位记者后来真的来了，尽管他们到得很晚。

当查维亚诺上校第一次也是最有新闻价值的一次发布会举行时，我决定向他提一个问题。其实当时在记者圈里我不代表任何报刊，因为我刚刚结束在哈瓦那新闻学院的学习，还没有正式工作。我既不是记者联合会或记者协会的成员，事实上也不能代表《波希米亚》杂志，因为德拉奥萨主任已经委派了几名记者参加发布会。但是，我的圣地亚哥的同行们并没有把我的主动提问看成是“非法”（当时这种做法很普遍），相反地，他们赞许我的做

法，给我开道，让我提问。

我问查维亚诺那两位被关押在蒙卡达兵营的妇女是谁？上校扫视了我一眼，有些吃惊和生气地回答说：“这里没有人被关押！”

司令部一位军官立即向上校靠近，低声对他说了些什么。上校越加不乐意地纠正说：“的确有妇女被捕，官方没有正式向我通告。可能逮捕了一些人……”他对所有在场的记者们说。

在我的这本书里，我会讲述为什么这位团长会有这一失误。

新闻发布会之后，我们又等了几个小时。傍晚，我们集合在兵营操场，开始参观“事件发生现场”。在这本书里，我会讲述我见到的情况。

在本书中，我讲述了我和摄影师如何设法避开上校的检查，把我们所得到的材料和照片带出兵营，并乘坐攻打蒙卡达兵营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架从圣地亚哥圣佩德里托机场起飞的飞机赶往哈瓦那。

抵达首都后，我径直去《波希米亚》杂志社。杂志社的大楼位于当时哈瓦那最重要的商业大街加利阿诺街附近的特洛卡特洛街。我第一次同克韦多社长见面，把我所带的材料全都交给了他。他犹豫地对我说：“你们疯了……难道你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然而，作为一个优秀记者和企业家，他在告辞前思考了一番。他靠在椅子上，点燃了一支长长的雪茄烟，要求我再次向他讲述所发生的一切，不要遗漏任何细节。当我讲述完后，他让我到编辑部去核对一下照片，让恩里克念一下我写的报道。

我后来得知，克韦多曾打电话给陆军司令塔韦尼利亚——塔韦尼利亚的儿子西里托是巴蒂斯塔的助手。他提醒当局他的杂志的实际能量：要么准许刊登蒙卡达事件的照片，要么关闭《波希米亚》杂志，他还可以到美国去向泛美新闻社揭露迫害。他们之间很快达成了妥协：准许刊登有关照片，但杂志上必须刊登官方对蒙卡达事件的解释，而不是其他版本。我是在后来才得知此事的。